



“三新”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 史 丹 渠慎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达到210084亿元，同比增长6.5%。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内生动力不强、消费需求不足等新的困难挑战，如何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赛道新动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三新”经济在经济转型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活力，使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造新内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塑造优势产业这三方面，无论是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新”经济不断创造新内需。当前，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在“三新”经济推动下，新型消费产品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赋予消费者全新体验，凭借创新供给产生增量需求。例如，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通过嵌入智能化、数字化、娱乐化等技术载体，相比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不仅使用成本更低，而且行驶体验更佳，使其逐步成为消费者们的新选择。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3年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市场占有率达到31.6%。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居民消费

规模最大的终端产品。再以即时零售这一新模式为例，随着我国网络零售增速逐年回落，线上线下整体竞争格局已趋于稳定，对于平台企业而言，若想继续保持之前的快速发展势头，打破线上零售的瓶颈限制，唯有同线下结合开展模式创新。即时零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化服务，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加快布局全渠道营销，实现零库存管理，使其成为零售行业的新增长点。据商务部研究院估计，2022年我国即时零售市场规模超过50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50%，预计2025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将达到2022年的3倍。

“三新”经济持续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技术不仅是正在崛起的新产业，也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并创造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这些数字技术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产业生产率和经营效益。以金融业为例，传统金融体系一直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普惠金融发展不均、风险防控手段单一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通过赋能改造金融业，创造出了“新金融”这一新业态。“新金融”主要包括两种新模式：一是“区块链+金融”，该模式通过利用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在支付、征信、众筹、资产确权 and 清算结算等业务中减少冗长的中间环节，以实现节省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二是“人工智能+金融”，该模式在前端可以用于服务客户，在中台支持授信、各类金融交易和金融分析中的决策，在后台用于风险防控和监督，推动金融服务更加个性化与智能化。

“三新”经济开始塑造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综合实力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但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人工智能、5G、云计算、共享经济等“三新”经济领域，我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形成竞争之势，部分产业甚至具备了占据全球制高点的潜力。相较于发达国家主要技术优势集中在基础研发领域，我国的技术优势则主要集中在大数据支撑、材料或设备改进等实验研发领域。在电商和社交平台的海量数据训练下，中国在图像识别和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而在5G领域，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2022年全球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共21万余件，涉及近4.7万项专利族，其中中国声明1.8万余项专利族，占比接近40%，排名世界第一。

加快推动“三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尽管我国“三新”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存在基础研发较为薄弱、要素供给不够充分、监管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为加快推动“三新”经济的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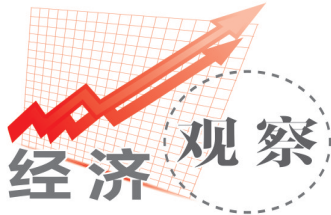
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破解制约“三新”经济发展的技术障碍。积极拓展国际研发资源边界，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整合国际创新资源，加大高端科创人才引进力度，与国外顶级研发团队联合开展研发攻关，加紧突破推动“三新”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优化新产品市场投放程序，打破行业内外部技术壁垒。对于全球供应体系依赖程度较小的行业，鼓励自主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加快投放市场，在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广应用，破解我国高技术产品核心技术供应不足的困境。

精准施用产业政策，持续推动“三新”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强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兼容，整合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开展科学评估，提高产业基金投入的精准度，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元宇宙、3D打印、无人驾驶等一批“三新”经济领域形成新供给。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应吸纳包括消费者、企业、协会、科研机构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以此保障产学研各方的长期合作利益，提高产业政策的科学性、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引导放管结合，不断完善“三新”经济的监管模式。进一步完善平台数据监管法规，以法律为依据，厘清数据产权以及平台企业的收益边界，引导企业遵守竞争规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消费者及专家的作用，在政策制定和监管实施中形成开放协同机制，逐步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加快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加强人才体系建设，为“三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整合国内相关研究和教学力量，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重点普及“三新”经济理念，培养和引进适应“三新”经济的系统设计、集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研发人才，逐步建立“三新”经济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利用市场手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让人才、高校、机构都“活”起来，以此激励从业人员创造更具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和商业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一带一路”合作如何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

□ 王学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普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些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升级。

硬联通侧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无一不是为了降低或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不断降低各国“边境上”壁垒。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世界贸易开放度有所提高，所有产品的平均关税从2006年的10.1%降至2021年的8.9%，反倾销、反补贴、安全保障措施等非关税壁垒也有所降低，同期全球进出口总额从29.6万亿美元增长至55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从1.2万亿美元增长至1.65万亿美元，商品和要素在全球大范围流动。

从中国实践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成果丰硕。在商品流动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39.2%上升至2022年的45.4%，中国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资本要素流动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实现了资本双向互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2400亿美元，共建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此外，技术、劳动力、数据等要素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双向流动。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潜力巨大。中国与共建国家、国际组织积极构建多层次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在全球层面、世界贸易组织层面、区域和多边层面持续深化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基本形成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政府间战略沟通为支撑、以地方和部门间政策协调为助力、以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项目合作为载体的政策沟通长效机制，不断推进各类多边合作，为商品和要素流动打下坚实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设施联通为商品和要素流动建立快速通道。共建国家及有关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健全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支付服务、金融监管合作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拓展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双边金融机构等投融资渠道平台，创新基金、人民币债券、绿色债券、主题金融债等投融资方式，资金融通为商品和要素流动、活跃市场氛围提供了便利。

软联通侧重制度型开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逐渐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趋势。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推进“边境后”规则融合。“边境后”规则融合具有广泛性，涉及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监管一致性、透明度与反腐败等领域。“边境后”规则融合具有一致性，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使不同

国家实行一致的经贸规则。“边境后”规则融合具有严格性，规则更细更严、标准更高更多。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型开放已有所显现。中国已与巴基斯坦、俄罗斯、希腊等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促进民用航空、气候变化、农业食品等多领域标准国际合作，与28个国家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有40多家全球大型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这些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制度型开放的有力体现。

面向未来，制度型开放将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趋势。在制度型开放中，欧盟有着较高的标准，货物、服务贸易极为便利，投资阻碍较小，人员可自由流动，使用共同货币，不同国家采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经贸规则。当今许多国际经贸合作组织都十分重视制度型开放，“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制度型开放将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软联通

推动绿色软联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目前全球已有151个国家提出了净零排放目标。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软联通可以从减排评估机制上发力，借鉴“国际气候行动计划”，建立包含气候指标仪表盘、年度气候行动监测报告、成员国气候政策执行情况评分机制、气候行动学习与对话互动平台等在内的减排评估机制。还可以从碳边境调节机制上发力，尽快建立适合共建国家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推动科技软联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推动“一带

一路”创新软联通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现象级的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火爆，也引发了侵犯知识产权、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泄露数据隐私和商业秘密等问题，应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基础上，尽快研究治理规则。二是5G技术治理规则。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作为5G大国，应与共建国家从战略和技术角度提出一系列加强5G安全举措。三是科技治理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技术贸易相关规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的全球流动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中国应与共建国家研究制定相关规则，扩大科技投资，促进技术流动。

推动数字软联通。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应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一是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事后监管模式、保护模式，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组织对跨境数据流动也作出不同程度规定，中国与共建国家可在审慎开放的基础上，逐步试点数据跨境流动。二是完善数字产品和服务规则。与非数字产品和服务相类似，数字产品和服务未来也面临征收关税、税收的问题，“一带一路”国家可通过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建立更加公平的数字税规则。三是制定数字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始终是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中国与共建国家应着手研究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四是完善本地进入规则。为保护国家安全和数字产业发展，国际上呈现提高门槛、限制进入的趋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将压减负面清单作为重要方式，不断完善本地进入规则。

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是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点统筹的战略性问题。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有观点认为高质量 development 就是不要增长，也有观点认为稳定经济大盘就要“大水漫灌”强刺激，这些都是不正确或者片面的。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要深刻理解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切实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是速度与质量目标的协同推进和有效实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关键取决于人民想要怎样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目标也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变为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也即发展质量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增长，合理的经济增长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必需的。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规律。只有物质积累到足够规模，才能有效孕育出更高质量的增长，比如创新动力更加充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等。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我国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

速度与质量绝非对立的关系，没有经济规模的扩张，就难以形成持久的质量提升，没有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就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新需要、难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二者具有动态一致性。当然，也要理性看待增长速度，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发展质量是摆在第一位的。正是基于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速度与质量目标的协同推进和有效实现，就是高质量发展。

关键是稳定和提全要素生产率

从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变化看，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关键是稳定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国际经验显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逐步上升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经济体增长差异和质量水平。目前，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均已迎来拐点，全社会也更加重视资源环境的生态价值而非单一的经济价值，单纯靠增加要素投入既不能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也无法持续改善发展质量。只有从全要素生产率入手，才能同时实现速度与质量目标，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对经济的贡献均有所下降，近年来虽略有回升，但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未来要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着手稳定和提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进步方面，既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形成更多非对称竞争优势；也要重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科技型企业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在规模经济方面，要协同发挥好需求端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供给端的强大生产能

速度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 黄卫挺

力优势，释放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为激发新动能提供土壤和市场，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在发展路径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要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更加自由流动，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在公平环境下优化分工、充分竞争和释放活力，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切实降低营商成本。

当务之急是形成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的速度与质量目标，当务之急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高速增长阶段存在较强的数量型发展激励机制，对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约束相对不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激励和约束并行的运行机制。要善用改革手段，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多元目标，谋划推出系列改革措施，有破有立、先立后破。既充分激发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也增强其责任和约束意识，同时要加强法治建设，降低预期管理成本，切实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政策支持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高质量发展的分阶段目标优化宏观政策组合，紧扣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效果。要扎实开展新出台政策的调查研究支撑和自评估、第三方评估工作，做好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给予市场必要的调整过渡期。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要按照发展基础、主体功能区定位等分类优化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平衡好经济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速度与质量、长期与短期的关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多元目标的实现。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的地方财政体制。支持地方政府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积极探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在调动市场和社会积极性方面，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大力弘扬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发挥好企业家、科学家在打造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